

中国社会学 20 年：回顾与前瞻

李 强, 郑 路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学系, 北京 100872)

[摘要] 近 20 年来, 中国社会学在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总体性研究与分支研究、社会学的本土化等方面都得到了迅速发展。面向 21 世纪的社会学需要进一步树立学术规范; 完善学科体系的建设; 加强对城市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组织社会学、社会学研究方法等分支学科的研究与教学; 在培养高层次研究人员的同时, 注重培养社会调查、社区管理、社会保障、社会工作、社会政策等应用型人才。

[关键词] 社会学; 学科体系; 学术规范; 社会学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420(2000)01-0019-08

社会学在中国大陆恢复发展至今, 已整整 20 年了。20 年来, 社会学已成长为我国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之一, 在学科分类中社会学属于一级学科, 在我国的普通高校中社会学已经成为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之一。社会学关注的是社会行为, 所谓社会行为是指影响社会利益的行为。社会学的目标是追求社会效益。社会效益的核心问题, 讲的是社会公平或社会公正问题。因此, 我们可以说, 实现社会公平是社会学追求的核心目标。追求效率和实现公平, 两者缺一不可。这里所说的社会公平是广义的社会公平, 例如, 它包括调整贫富差距、建立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创造就业机会、减少失业人口、治理贫困、消除犯罪、保护环境等等。因此, 社会学在实现社会公正、解决社会问题、追求社会发展方面, 发挥着主导作用。

下面将从五个方面对 20 年来社会学在中国

大陆的发展做一些总结和展望。

一、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

在社会学发展的历程上历来有两大流派, 一派注重于理论研究, 另一派注重于实证研究。相比较而言, 美国社会学自 20 世纪 30 年代芝加哥学派开创实证研究的风格以来, 更注重于对实际社会问题的研究。而以英、法、德为代表的欧洲社会学则在理论研究方面更突出一些。中国社会学在恢复之初, 主要是请美国社会学家来华讲学, 受到美国社会学的研究风格影响较多一些, 因此, 20 年来的中国社会学在研究风格上更具有实证研究的特点。

中国社会学的这一特点使得社会学在学科发展上具有一定的优势。因为, 中国社会学恢复发

[收稿日期] 1999-10-15

[作者简介] 李 强(1950—), 男, 北京市人,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

郑 路(1975—), 男, 重庆市人,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

展的20年恰好也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大步前进的20年。体制变迁所引发的众多的社会问题,急需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给予关注和提出解决办法。因此,20年来,社会学参与了众多社会问题的研究与社会政策的制定。这方面的研究数量巨大、种类繁多,本文不可能面面俱到地加以论述,下面试举几例比较突出的研究成果。

1. 小城镇问题研究

这一问题最早由费孝通教授提出。该研究认为,小城镇是我国实现城市化的主要措施和形式。我国人口众多,完全靠大城市吸纳人口以实现城市化难度太大,而小城镇可以作为中国城市化中人口的“蓄水池”、“节流闸”,可以防止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小城镇的发展可以将现代城市文明向农村扩散,使农村生活逐步现代化。小城镇也是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商品交换的重要场所,对商品生产和流通起引导、促进和疏通作用^①。小城镇研究对于我国政府的城市化决策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2. 社会指标研究

作为社会测量、社会预测的手段,社会指标及社会指标体系在国际上是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发展起来的。其主要功能在于反映社会现象,监测社会过程,预测和计划社会发展,衡量、比较或评价社会状况。我国对社会指标的研究始于8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和国家统计局社会司的一些研究人员完成了一系列基础性、开创性的研究成果^②。这些研究在总结国外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国情,对社会指标的定义、特点、类型进行了分析,探讨了社会指标及其体系的设计方案以及数据的获得途径,并对我国社会指标体系的建立做出了基本设想。近年来,一批研究人员在综合社会指标体系、专门性指标体系、社会形势预测和社会预警指标体系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应用性研究。这些成果已被各级决策部门和管理部门广泛采纳,政府决策从过去的单纯重视经济发展,转变为经济与社会发展并重的战略。从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政府在制定发展规划时,也正式将“国民经济计划”更改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近来,

我国进一步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这与社会指标的理论思路是完全一致的。

3. 贫富差距研究

近20年来,中国社会已经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社会,转变成了超过国际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社会。这个结论是笔者在对中国居民的收入分配进行测量,并在国际比较的基础上做出的。贫富差距是一种客观事实,对于此种客观事实人们会有不同的主观评价,有时候会引发对于什么是社会公平、社会公正的争论。贫富差距本身和对于社会公平的争论都会对社会稳定产生影响。因此,这是任何一个政府决策时始终密切关注的领域。社会学者的研究指出,我国目前的困境在于贫富差距拉大和平均主义分配并存的局面。因此,从对策上看,采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做法是比较恰当的。在不同的分析维度上,贫富差距问题可以转换为地区差距问题,以及贫困问题。这些问题都已成为研究者乃至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改革开放以来,在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人们在更高层次上提出解决贫困的要求。贫富差距的扩大也导致了相对贫困问题变得日益突出。贫困问题在目前还出现了多元化趋势,研究者不仅仍然需要关注我国西部、西南部集中连片的农村贫困地区,还必须应对城市国企下岗职工的贫困问题、城市流民的贫困问题以及贫民窟等系列问题的挑战。在对问题的现状和产生机制进行描述和分析的同时,研究重点也从理论研究向方法研究和对策研究倾斜^③。

4. 工业社会学与国企改革研究

中国的工业社会学从一开始就带有很强的实证色彩,大量研究成果都建立在对企业的实地调查基础上。从宏观方面的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企业与社区的关系、企业与市场的关系,到微观方面的企业内部人际关系、企业员工的归属感、职工素质对生产效率的影响,社会学者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④。这些成果从实践上有利于帮助企业完善经营机制,增强活力,同时也为工业社会学理论的发展积累了经验材料。研究者们不仅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研究对象,而且还深入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进行工业社会学研究,一方面以比较

研究的视角为国有企业的改革提供对策,另一方面也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探讨后者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意义^⑤。

5. 流动人口研究

中国社会学的流动人口研究主要指的是农村人口由农村到城市,从内地至沿海地区的流动。中国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部分人口的流动和就业状况,将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农业现代化的进程。80年代初期占上风的观点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应就地安置,通过“离土不离乡”,发展乡镇企业逐步加以解决,从而控制住剩余劳动力的“盲目”流动。然而,事实证明,自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规模宏大的“民工潮”已形成了不可逆转的趋势。研究者通过深入的调查发现,农民工的外出或迁移,是具有明确的动因和目标的。所谓“盲目”,只是一种非科学语言的价值判断。这些“非单位人”在城市中的劳动和居住不仅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而且还促进了城市管理从“单位控制”体制向“市政管理”体制的转化,并推动着基础设施的改造和完善。与此同时,这些出生于农村的打工者自身在生活质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从相对封闭、相互隔离的社会向开放的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民工潮”冲击的是城乡间的“壁垒”,探索的是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产业转移的一条可能之路^⑥。

6. 家庭、婚姻、妇女问题研究

家庭、婚姻及妇女问题是中国社会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该领域的研究课题广泛,近年来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80年代的研究领域多集中在对离婚、婚外恋、独身、老年婚姻等问题的关注上,90年代以来又将研究领域扩展到了婚姻与性、家庭暴力、家庭文化和家庭史等方面^⑦。妇女研究除了在理论和方法上的继续深化之外,社会学者还就妇女地位的历史与现状、妇女人口素质、社会结构变迁与妇女职业发展、女性价值的自我认同等问题进行了考察。有关性、性别、女性的情感与性等一批该领域的研究专著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许多学者还应邀参加了关于修订《婚姻法》的讨论,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发

挥了积极的作用。

当然,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是分不开的。社会学者对社会问题的研究和分析之所以与一般的调研不同,就在于他们是从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出发进行的研究。在提出问题、收集素材、分析材料、做出结论的每一个研究步骤的背后,也都有理论的引导和支持。实证研究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展开的,通过研究获得的新发现往往又对原有的理论提出了新的问题。由此才会出现经过改造的“新理论”的提出,才会有范式的“革命”。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就是在理论与实证研究的不断互动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

社会学在中国恢复后的20年间,从理论上看,国内学者主要是在跟踪国际社会学理论的进展,自身的理论创新相对薄弱。一些学者在社会学的元理论和实质性理论的研究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例如,有的研究者认为,社会学认识论即是对社会学研究领域中的认识过程及其本质和规律进行研究的一种理论。把社会学认识论作为一门学科进行系统研究是非常必要的^⑧。以此为指导思想,许多学者对有关社会学方法论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这些基础性的理论工作,为促进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在实质性理论方面,“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社会结构论”是国内学者提出的几个影响较大的理论。其中又以“社会运行论”最为系统,形成了体系。

“社会运行论”系统论证了一种关于社会学的新观点,即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运行和社会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特别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在对中外社会学界的有关研究进行回顾和考察的基础上,该理论对社会运行的人口条件、环境资源条件、经济条件、文化条件和社会心理条件,以及社会运行的动力机制、整合机制、激励机制、控制机制和保障机制进行了论述。同时还研究了对我国社会运行产生特殊影响的内外两个条件,即转型时期的转型效应和迟发展国家的迟发展效应^⑨。“社会运行论”是社会学基本理论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成果,在国内外已产生了一定影响。

从发展前景看,在对国外社会学理论进行研究和借鉴的基础上,创造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学理论仍是新世纪里中国社会学界需加倍努力的方向。当然,从社会学的发展经验看,由发展“中距理论”^⑩入手,是一条较好的途径。关于这一点,本文的第三部分将作进一步阐述。

二、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

社会学研究的目的之一是为了从社会学独有的视角来描述“社会事实”,并对其进行理论阐释。在实现这一目的的过程中,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是互为补充、互相验证的研究手段。对于某一项具体研究,可能采用定量研究更好或采用定性研究更好,或二者兼而用之。研究对象以及理论取向的不同,决定了方法的采用。

定性研究有利于发掘事物的深层次原因,对观察对象的细微之处进行把握。作为定量研究的替换手段,在研究特殊群体和敏感复杂的社会心理问题,定性技术有其独到的功用。在操作中,定性研究采用的是比定量分析更模糊、更大胆的方法,因此更容易具有创造性和新颖性。社会学者常用的定性研究方法有访谈法、观察法等。一般认为,这类方法的不足之处在于定性分析的样本不能够代表总体,得出的结论不一定具有普遍性。同时,定性研究方法的实施成功与否及其研究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个人的专业素养和研究经验。实施过程中的灵活性和主观性,也常常使研究结果在可靠性和有效性方面受到较大影响。

定量研究是建立在统计理论的基础上的。其优点在于能够通过分析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样本,来推论总体特征。以定量研究中常用的统计调查为例,它首先是从一定的理论假设出发,设计出标准化、具有内在逻辑结构的问卷,然后经过规范的抽样、调查实施、数据整理和统计分析,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或者对新的发现做出理论解释。定量研究的缺陷在于难以获得深入的信息,对具体的社会过程及人们的深层次动机容易忽略,同时也不适用于对惟一发生的现象进行因果性分析。

在粗略介绍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特点和局限性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方法本身而言,二者并无优劣之分。对于社会学者来说,关键之处在于从理论和实践上提高选择和应用这些方法的能力。

近20年来,国内社会学者在这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定性研究方面,比较突出的成果有对于农村社区变迁的研究、对于口述史的研究、对于性学的研究、对于农民工的研究。在这些研究领域,发表了一批运用观察法、访谈法等定性研究方法完成的上乘之作。除了对学术的挚爱和扎实的理论功底,这些社会学者对于方法上的熟练运用和精心操作也是其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的关键。

数据的采集和分析在定量分析中占有核心地位。除了政府有关部门提供的统计资料以外,社会学者还组织了大量抽样调查。小到一个组织内部的抽样调查,大到全国性的样本,这些年来众多的社会学调查研究机构收集了大量的数据,积累了丰富的调查经验。在现代统计学理论和计算机技术的渗透和推动下,从抽样到数据形成的整个过程日益规范化和科学化。在数据的分析方法上,从常用的频数表、交互表,到方差分析、多元线性回归、logistic回归、对数线性模型、事件史分析等等,研究者开始运用越来越多的高级统计方法来探索数据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有助于更加深入地描述和解释社会现实。在这方面已有越来越多的运用定量分析技术的论文和著作问世。但总的来看,定量研究在中国的社会学研究里还远未达到完善的地步。一部分抽样调查在实施过程中还不太规范,使得在误差之外还增加了人为的错误,直接影响了研究成果的可信度。另一方面,不少社会学者对计算机技术和统计理论还比较生疏,导致对许多数据的分析流于表面,无形中浪费了宝贵资源。近几年来,在国际社会学界的资助下,国内已举办过三次高级统计方法班,邀请海外华人学者向大陆同行介绍社会科学统计方法,这有助于帮助国内学者缩小在方法上的差距。笔者在此还想指出的是,与美国、欧洲的社会学界相比,中国大陆的社会学界尚未建立起资源共享的公共

数据库,以推动定量研究的教学和科研实践。这也是未来几年内应该解决的一个问题。

三、国际经验与中国本土化

近年来的社会学研究证明,中国的社会变迁趋势与国际上的趋势出现了一致性变化,中国社会日益加入到了全球一体化的格局之中。在此背景下,国内社会学界,一方面面临着如何与国际社会学接轨,增进国际交流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一直在为社会学的中国本土化而进行探索。

社会学重建20年以来所获得的成就与学习国际经验是分不开的。在社会科学领域,社会学是建国以来最早获准向外国学者开放到基层进行实地社会调查的学科。当时,西方世界对重新打开国门后中国大陆的了解,多来自于这批外国学者的介绍。这些年来,许多外国学者经常应邀到国内来举办讲习班,或做学术演讲。通过这些交流,国内学界得以同吉登斯、哈贝马斯等世界知名学者直接进行对话。国内学者也经常到世界上一些社会学较为发达的国家进行访问、考察和研修。中外学者还合作完成了一些在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的研究项目。每年,都有一批学生到国外深造社会学,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回国从事教学、研究工作,其中一些已成为国内知名的社会学家。同时,对国外最新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介绍也日益取得进展,大量译著和评介文章相继出版和发表。这些学术交流和学科建设工作都缩小了中国社会学与国际的差距,同时也把中国社会学界的研究成果介绍到了国外。一些学者还常常被国外的大学聘请去讲授社会学课程,介绍他们的研究成果。

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市场转型”过程,已成为国际社会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市场转型的研究对象集中在前苏联、东欧、中国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路径依赖”使这些原本就有着相似经济、文化或政治背景的社会,在转型过程中出现了结构上的相似性。它们演进而成的混合经济也同样以混合的组织和产权形式为特征。中外学者涉及的这方面的主题大致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新兴的市场制度、市场转型过程中的“局部”改革、市场转型对社会分层秩序的影响、市场

转型之前景等等,有关这些方面的研究是中国学者与国外学者进行交流的主要领域。近年来,在美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大陆等地已举行了多次有关“市场转型”的国际研讨会,其成果十分显著。此外,“世界村”的形成使全球的社会学家已开始研究共同面临的一些问题,例如,全球化及世界体系、高科技发展的社会后果、跨国公司,以及国际移民、因特网、环境问题等等。这也进一步促进了中外学者间的学习与交流。然而,中国社会有其独特的社会文化模式,发源于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并不能解决我们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中国学者在学习国外经验,引进国外理论的同时,也渐渐开始了反思和自省,社会学“中国化”的问题再次被推到了前台。

一些社会学者以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曲折发展为脉络,系统研究了中国社会学发生、发展、中断、恢复的过程,从社会学史的角度介绍了社会学中国化的历程。他们还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进一步探讨了社会学的中国化问题,认为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中所包含的丰富社会学内涵是中国社会学内在的思想渊源,中国的社会学者应将这些社会思想认真挖掘、整理出来,予以科学解释^①。此种建议在操作上具有较大难度,究竟如何实现将中国文化中的社会思想、社会哲学转换为社会学的理论,大批学者仍在为此而继续努力。几年前,一场名为“社会科学规范化与本土化”的讨论,进一步深化了社会学者对社会学中国化的认识。值得一提的是,参加讨论的学者大多都具有西方教育的背景,或对西方的理论进行过系统的研究,他们自觉对“本土化”问题进行讨论,反映了中国学者在学习中的“反思性”。然而认识到本土化之重要性与如何实现本土化,毕竟还不是一回事。

半个多世纪前,吴文藻先生曾指出:“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言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与事实揉和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又必须有了本此眼光训练出来的独立的科学人才,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社会学才算彻底的中国化。”^②吴文藻先生是从理论创新与人才培养两

方面来谈社会学中国化问题的。对于他在理论方面的中国化思路,笔者非常赞同。在笔者看来,其核心是以建立关于中国社会的“中距理论”来实现社会学的中国化。目前,创建类似帕森斯功能主义一类宏大理论体系的时机尚未成熟,因为这类体系所必需的理论上和经验上的基础工作进行得还远远不够。中距理论的作用,就是要连接宏大理论与经验事实之间的鸿沟,在微观具体与宏观抽象的中间位置,建立起一种中介。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墨顿指出的那样,没有理论和调查研究之间的交替作用,理论性方案依旧只能是仅仅具有启发性作用,但却经不起反驳的概念堆积;同样,经验性调查也只能停留在不完整、无条理的层次,对社会学知识的增长毫无作用。在实践上,中距理论一方面可以在较低的抽象层次上将经验事实表达出来,另一方面还具有进一步综合为总体理论的潜力。笔者认为,社会学的中国化,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就是从对中国社会的经验研究出发,创立关于中国社会的中距理论。在新世纪里,中国社会学界仍面临着“市场转型”的重大课题,正如近代西方社会的转型过程孕育出了马克思、迪尔凯姆、韦伯等社会学大师一样,我们也期待着在21世纪对中国“市场转型”的研究中,中国的社会学者能有更多的概念和理论的突破,以此为契机实现社会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并由此产生出一批中国的社会学大师。

四、社会学的总体研究与分支研究

恢复后的中国社会学在本质上既不同于西方社会学,也不是旧中国社会学的翻版。所以,在恢复之初,大陆的社会学者曾对于中国社会学的地位、对象、性质及理论体系等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而后提出的一些实质性理论,也大多是对社会整体的基本构成及各部分相互关系进行的研究,并试图揭示社会整体的发展规律。这些研究基本上属于社会学的总体研究。到今天,社会学者更多地走向了分支社会学的研究。下面仅以三个主要的分支社会学为例做一简要说明。

1. 社会分层与流动

社会分层与流动是社会学最重要的分支领域之一。近20年来,中国社会处于社会转型的加速期,人们在地域、职业、社会经济地位等方面的流动越来越频繁,对社会结构产生重要影响的新的社会群体在形成,影响社会分层的机制也在发生着变化。总之,社会分层体系处于急剧变迁之中,这与西方近几十年来较为稳定、成型的社会结构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社会的这些特点已引起了中外社会学者的极大关注。近年来,国内学者取得的较为突出的成果包括:阶级地位和阶级关系的研究、地位结构观的研究、职业分层和收入分层的研究、精英地位获得的研究、分层机制变化的研究、职业声望和社会认同研究、职业流动研究等等。目前,许多社会学者都在为建构中国社会的分层理论体系而努力,这项研究将有助于对社会分层与流动的一些基本问题做出解答,具有在理论上实现突破的潜力。此外,学者们对民营企业家、城市农民工等群体的研究正在日益深入,研究采用的理论视角也在日益丰富。需要指出的是,国内学者在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中,对概念操作化的认识略显不足,同时在统计分析方法上也有所欠缺,这些方面都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2. 劳动社会学

劳动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首先是从描述、分析和研究具体的社会问题开始的。早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由于“文革”的影响,城镇的劳动就业问题,尤其是青年就业问题,就引起了社会学者的重视。学者们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城镇青年的就业动机和择业意愿进行了研究,并结合当时的社会状况,提出了改革和完善教育制度和劳动人事制度,建立就业指导、咨询和职业需求调查机构等建议,同时也提出了“变消极待业为积极的就业培训”等观点。这些成果受到了政府部门的重视,在当时产生了积极的实际效果^⑬。近几年来,在劳动社会学日益学科化的同时,“下岗”和失业问题又作为一项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摆在了人们的面前,劳动社会学者从影响再就业的社会制度因素和个人心理因素、下岗人员的行为选择策略和决策模式、市场机制与再就业、社会保障制度与再就业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提出了许多行之有

效的政策建议。在推动社会良性运行的同时,也促进了该学科的发展。

3. 城市社会学

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包含着城市化的过程,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应该如何走,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已成为亟需解答的问题。城市社会学在这一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社会学者从城市化的定义、中国城市化历史的评价、城市化发展道路、隐形城市化、城市的持续发展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有的学者强调小城镇、乡镇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的突出作用;有的学者认为,中等城市在规模效益上优于小城市、小城镇,在避免和减少“城市病”上优于大城市;另有学者从借鉴国外历史经验出发,认为应走大、中、小城市并举的道路;还有一种观点强调应以大中城市为主导,大、中、小城市全面发展^①。笔者认为,在地区间生态环境、产业布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下,中国的城市化道路也同样应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关键是把握好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三者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城市社会学对城市社区的研究大大促进了城市的市政管理和居民居住观念的改变,具有多种功能的社区已被看成是城市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对社区建设和规划做出研究,将有利于推动城市现代化的发展,促进城市社会由“单位”社会向“社区”社会的转变。目前,社区研究已成为社会学中一项非常重要、很有潜力的研究领域。

五、面向 21 世纪的中国社会学

在新的世纪里,中国社会学仍面临着许多任务与挑战。首先,是进一步建立学术规范的问题。所谓建立学术规范是有多方面内容的,它包括学术术语的规范化、研究方法的规范化、学术评审的规范化、学术队伍的规范化等等。其目的是要保证学术的积累性,建立社会学理论的创新机制。因此,对于一般政策性调研报告与社会学论文的区别,对于有关社会的思考或想法与社会学知识的区别,对于社会学研究应遵循哪些基本规则,如何评价学术作品,何为学术创新等等问题,社会学者还需进行深入的认识。其次,是要完善社会学的学科体系。目前的状况是,一些社会学分支领域还没有社会学者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反映在教学上,是一些核心课程无法与国外同行的水平相比,或尚未开设。研究人员及师资的培养和引进,仍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此外,为了对中国社会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做出更好的解答,应该进一步加强城市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组织社会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等领域的科研和教学工作。在继续培养高水平研究人员的同时,有条件的社会学系还可以开设社会调查、社区管理、社会保障、社会工作、社会政策等专业,在本科、硕士层次培养社会学的应用型人才。这不仅有利于社会学自身的发展,而且有助于社会学者为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① 李守经,邱泽奇.小城镇研究[A].中国社会学年鉴(1979~1989)[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

② 参见郑杭生,李强,李路路.社会指标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何建章,朱庆芳.中国社会指标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朱庆芳.社会指标的应用[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

③ 参见李强.中国扶贫之路[M].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④ 余荣珮.工业社会学在中国的研究与进展[A].中国社会学年鉴(1989~1993)[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

书出版社,1994.

⑤ 参见马戎,王汉生,刘世定.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历史与运行机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戴建中.中国私营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机制[A].中国社会学年鉴(1992.7~1995.6)[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⑥ 参见黄平.寻求生存——当代中国农村外出人口的社会学研究[M].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李强.中国大陆城市农民工的职业流动[J].社会学研究,1999(3).

⑦ 参见郑晨.婚姻家庭研究综述[A].中国社会学年鉴(1992.7~1995.6)[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

社, 1996.

⑧ 参见袁方. 社会学认识论的初步探讨[J]. 社会学研究, 1993, (5).

⑨ 参见郑杭生. 社会运行导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基本理论的一种探索[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

⑩ 中距理论, theory of middle range, 指既与宏观大理论相区别, 又与微观经验相区别的中间层次的理论。

⑪ 参见张琢. 中国社会学与社会学百年史(1891~1991)[M]. 香港: 香港中华书局, 1992; 社会学之国学

寻踪[J]. 社会学研究, 1995, (5).

⑫ 转引自梁治平. 规范化与本土化[J]. 中国书评, 1995, (1).

⑬ 参见折晓叶. 劳动社会学研究综述[A]. 中国社会学年鉴(1979~1989)[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9.

⑭ 参见吴铎. 城市社会学研究的新进展[A]. 中国社会学年鉴(1992. 7~1995. 6)[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6.

Twenty Years of Sociology in Mainland China: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LI Qiang ZHENG Lu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In the recent two decades, sociology experienced a period of flourish development in Mainland China. Fruitful achievements had been gained in the areas of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e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es, general and specific sociology, as well as sociological indigenization. Facing the new century,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emphasis should be attached to the following issues: establishing academic norms, perfec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cademic system, enhancing researches and teaching in urban sociology, sociology of economics, sociology of organization and sociological research methods. The author also proposes that more applied sociologists be nurtured in areas of social survey, community administration, social security, social work and social policy. High level sociological researchers should be trained, too.

Key words: sociology; academic system; academic norms; sociological indigenization

(责任编辑 刘 晶)